

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:毛庆. 楚赋“三徒”中为何宋赋独传千古[J]. 长江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21, 44(1): 40-43.

# 楚赋“三徒”中为何宋赋独传千古

毛庆

(湖北省社会科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;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6)

**摘要:**司马迁于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,将宋玉、唐勒、景差列为一类,然只有宋玉作品能流传千古,为何如此?多年来没人对这一问题作过认真研究,当然更不可能有比较中肯的分析。此次将《文选》中凡录有赋作之作家的赋与文列为对象,以出现于《辞源》中的四字成语(或成词)为统计材料,并将宋玉、司马相如、扬雄之具体数字统计出来,发现宋玉这一数字远高于司马相如和扬雄,也高于《文选》中的所有上述作家。由此得出结论: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“赋祖”地位不可动摇!唐勒、景差二人之艺术水平与文学成就,实不能与宋玉相比,二者并不在一个层次。唐勒、景差的赋、文失传,作为先秦文献,必然因素居多;同样,宋玉文章所以能流传千古,也主要是必然因素在起作用。

**关键词:**宋玉;唐勒;景差;四字成语

**分类号:**K231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21)01-0040-04

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曰:

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;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。其后楚日以削,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<sup>[1](P2491)</sup>

司马迁这段话,明确地将宋玉、唐勒、景差归为一类,说明了他们对屈原的继承关系,且都以赋的创作成就著称于世。按司马迁的介绍,一般认为他们应处于同一层次,如果强调宋玉排在前面,最多略为领先一点而已。但是这样一来,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横亘在我们面前:为何宋玉的十几篇作品可以流传千古,而唐勒、景差的作品一篇也未能留下来?以笔者所见,多少年来没人对这一问题作过认真研究,当然更不可能有比较中肯的分析。

研究史上出现这一现象是很自然的。

其最大的障碍,是缺乏比较对象。宋玉辞、赋流传至今仍有十多篇(这点后面还将论到),而唐勒、景差则一篇也没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录“唐勒赋四篇”“宋玉赋16篇”,而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仅记

“楚大夫宋玉集三卷”,唐勒的不见了,说明至迟到隋,唐勒作品已失传。1972年,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,有二十余枚残简为赋作,首简上端背面写有“唐革”二字。有学者认为此赋为唐勒所作,定名为《御赋》,也有学者同意其定名,但认为是宋玉所作,不过即使定为唐勒作,也与我们论题无涉,唐勒赋仍然是失传了。至于景差之作品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均无记载,王逸《楚辞章句·大招章句》之题解曰:“《大招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。或曰景差,疑不能明也。”<sup>①</sup>他在作者问题上拿出了一个两可的结论,却没有拿出任何根据。这就需要辩明一下,不然就不能说景差未有作品流传。

我们先看《大招》题解:

《大招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。或曰景差,疑不能明也。屈原放流九年,忧思烦乱,精神越散,与形离别,恐命将终,所行不遂,故愤然大招其魂。盛称楚国之乐,崇怀、襄之德。以比三王,能任用贤;公卿明察,能荐举人;宜辅佐之,以兴至治。因以讽谏,达己之志也。

收稿日期:2020-11-01

作者简介:毛庆(1945—),男,湖北武汉人,研究员,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,主要从事楚辞研究。

① 王逸《楚辞章句》,清同治壬申(1872)金陵书局校勘汲古阁本。

这题解耐人寻味。除“或曰景差,疑不能明”两句,其余全是以屈原作解。实际是曲线表明了他的态度。那么,他为何不就肯定是屈原作呢?当然有他的难言之隐。他晚于班固几十年,又作过校书郎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当然看过。而《艺文志》中没有景差的作品,又明记“屈原赋二十五篇”,《楚辞章句·目录》从《离骚》到《渔父》已是二十五篇,故《大招》的作者不能说得太死,结果便出现了这样滑稽的题解。为什么不说是宋玉作呢?他已将《招魂》判给了宋玉,不可能把《大招》的著作权也判给他。那为何不写“疑为唐勒”呢?因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已明记“唐勒赋四篇”,这四篇里估计没有《大招》,王逸就只好把景差拉来作陪附——反正景差的作品在班固时就已失传,他说“或曰”,你也没证据说他不对。这点洪兴祖看得很清楚,特注明:“屈原赋二十五篇,《渔父》以上是也,《大招》恐非屈原作。”于是就出现了三选一之格局:《远游》《招魂》《大招》三者,屈原只能居其一。例如,你若定《招魂》为屈原作,那《远游》和《大招》就应排除;选《远游》或《大招》亦同样。当然,你也可以硬将其中两篇判给屈原,不过这就只能动《渔父》以上的篇目了(实际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些学者就是这样做的),只是这样做问题更大。此处便不多叙。

判明《大招》非景差作,第二点便接踵而来,这问题类似于一种悖论:要解决这问题必须有比较对象,可有了比较对象,这问题就不会产生。要知道三人中为何宋玉作品独能流传千古,就需要将唐勒、景差的作品与之对比;可唐勒、景差作品如果流传至今,上述问题本身就不会出现。

另外,古代文学作品能否流传下来,作品质量和艺术水平并非唯一原因,帝王的干预,时代的好尚,读者的审美趣味,甚至各种偶发事件,都可能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。

这几个因素加起来,形成一股合力,使研究者关前止步,不敢叩问,或者,想都不去想。

然而,这个问题又确实需要解决。笔者以前读某些否认宋玉作品之文,以及与同行们的私下交流,发现其字里行间、言语之间总透出这样的疑问:司马迁明言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三人承业相同,水平、成就、地位均都在同一层次,为何独宋玉留存作品十几篇,而

唐勒、景差一篇不留?这疑问相当于终极追问,再加上上世纪疑古思潮之影响,致使宋玉作品一篇一篇被怀疑否定,最后确定无疑的只剩下《九辩》一篇。如果不是刘向将它收在《楚辞》里,恐怕这一篇也会被否定掉。直到《御赋》残简出土以后,这种情况才逐渐改变。然而只要这终极疑问存在,说不定哪天怀疑否定思潮又卷土重来,而这将直接影响到宋玉艺术成就的评价及赋祖地位的认定。

因此,要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,即使再困难,后人也要努力去做。没有了比较对象,我们只能转变思路,从宋玉对中国语言、文学乃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入手,并与其他近似的有替代意义的对象相比,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东西,探寻到某些因素,进而经过推理与思考去解决问题。

几十年来,笔者曾多次阅读《文选》,总感到宋玉的文学语汇对我国古代文学语言体系有相当影响,其作品中的一些成词、成语、短语等,在我们古代文学语言中,保留的数量很是可观。为具体证实这点,此次将《文选》中凡录有赋作之作家的赋与文列为对象,以出现于《辞源》中的四字成语(或成词)为统计材料,并将宋玉、司马相如、扬雄之具体数字统计出来,将《辞源》全部翻检一过,看看具体情况究竟如何?得到的数字是惊人的!

除《九辩》《招魂》外(《文选》将《招魂》亦归于宋玉,但此次统计辞作不计),《文选》选了宋玉赋四篇——《高唐赋》《神女赋》《风赋》《登徒子好色赋》,文一篇——《对楚王问》(《汉书·艺文志》统称为赋),《辞源》共录有其成语(或成词,以下均简称成语)十一处<sup>[2]</sup>,现列于下:

巫山神女(0962)	延年益寿(1030)	蜚蜚蜿蜿(2773) <sup>①</sup>	迴肠伤气(3054)	《高唐赋》
空穴来风(2324)				《风赋》
蓬头历齿(2703)				《登徒子好色赋》
下里巴人(0057)	引商刻羽(1041)	曲高和寡(1455)	瑰意琦行(2073)	阳春白雪(3291)
				《对楚王问》

(括号中数字为《辞源》页码,以下同)

表面看来,此数不多,然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,能有此数已是十分惊人。这只要稍作比较,你就会明白。

① 按:《高唐赋》之“蜚蜚蜿蜿”,《辞源》以“蜚蜿”形式录入。《高唐赋》之“迴肠伤气”,《神女赋》作“迴肠伤气”,只算一处。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之“蓬头率耳,齟唇历齿”,《辞源》作“蓬头历齿”。

《文选》选取的司马相如之赋与文,其在《辞源》中的成语有六处:

乌有先生(1925) 眇眇忽忽(2207)

《子虚赋》

色授魂与(2611)

《上林赋》

斯事体大(1373)

《难蜀父老文》

寡廉鲜耻(0857)

《喻巴蜀檄》

枯木朽株(1547)

《上书谏猎》

《文选》所选的扬雄之赋与文,其在《辞源》中的成语有三处:

云谲波诡(3332)

《甘泉赋》

纤青拖紫(2395) 萧规曹随(2722) 《解嘲》

如此一比,宋玉的成就与地位就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了。就各人语汇对我国古代文学之影响、贡献而言,司马相如、扬雄都远远不如宋玉(两人的成语加起来还没宋玉的多)。笔者的搜检可能有遗漏,但即使补检出一两个成语,也不可能改变这一状况。而且,在搜检过程中,笔者也注意了一下《文选》中其他赋家之情况,虽未对他们赋、文作以上形式之统计,但基本可以下断语,其数量均不及宋玉。<sup>①</sup>

宋玉的以上成语与司马相如、扬雄的相比,还有一个显著特点,即生命力极强。至今还存在于我们文章中和口头上的,有巫山神女、延年益寿、迴肠伤气、空穴来风、下里巴人、曲高和寡、瑰意琦行、阳春白雪,占其全部成语的72%;司马相如的则有寡廉鲜耻、枯木朽株,占其全部成语的33%;扬雄的则有云谲波诡、萧规曹随,占其全部成语的66%。<sup>②</sup>宋玉文中所用成语,自创比例较大。司马相如和扬雄文章中的成语,引用儒家经典的较多。出现这种情况,自然是与宋玉在赋这种文体上创造性更强有关。而元光元年(前134),汉武帝采纳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国策,对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影响,恐怕也是因素之一。

这里,如果我们从另外的角度看宋玉以上贡献,便会从心底由衷地叹佩!司马相如和扬雄是杰出的语言、文字学家,扬雄更对民间口头语言独有研究,撰有经典著作《方言》。就历史存留材料及影响而言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均有《司马相如传》,卓文君与之私奔的佳话千古流传。《汉书》亦有《扬雄传》,班固将

其事迹记录较详细且褒赞有加。在思想史上,司马相如之《难蜀父老文》《喻巴蜀檄》《哀秦二世赋》均为思想史上之重要材料。扬雄的地位则更高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曰:“自孔子后,缀文之士众矣,唯孟轲、孙况(荀况)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,此数公者,皆博物洽闻,通达古今,其言有补于世。”<sup>[3](P1972)</sup>司马光的评论甚至走到了另一极端,他在《读玄》中曰:“呜呼!扬子真大儒邪!孔子既没,知圣人之道者,非子云而谁?孟与荀殆不足拟,况其余乎?”<sup>③</sup>按说,司马相如和扬雄文章中存活至今的成语,应不少于宋玉的,可事实就是少于宋玉,而且少得太多。由此可见宋玉锻造语言能力之强和成就之高!

为此,还应特别说明几点:

第一,此统计方法优点在于明晰严格,缺点是有些机械。宋玉赋、文中四字成词由两词构成者,《辞源》往往只取其一。即以《凤赋》为例:“溥畅而至”,取“溥畅”(1858);“枳句来巢”,取“枳句”(1550);“勃郁烦冤”(376)取“勃郁”。因凡是两字词均不属于统计范围,故此类词并未统计进来。

第二,同样,宋玉赋、文中两字词都不能统计进来,其中有的成为生动优美、含义隽永而流传千古的文学意象,如“朝云”“云雨”等,不能计入虽十分可惜,然限于规则只能如此。

第三,凡进行统计则必须制定标准,我们此次的标准之一是诗作除外,因司马相如、扬雄等均无诗作,如将诗歌纳入则不对等。如此宋玉当然吃亏,他的《九辩》是继屈骚之后的绝代辞作,宋玉在《九辩》中为我国文学语言创造了不少佳词。《辞源》仅“心”部一栏,就有《九辩》中的“恢台”“凄怆”“懔懔”“懔懔”“懔懔”等等,其中“懔懔”“懔懔”“懔懔”还都在同一页(1166页)。若计入,可以看出贡献更大。

综上所述,仅就语言方面而论,宋玉在赋史上之地位已不可动摇。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规律,即某一文体、文学类型的开创型先祖之作品,其成语、成词保留于文学史上,比之后来同文体、同类型作家必然是更多。这一规律体现于儒家,是孔子、孟子(《论语》《孟子》);体现于道家,是老子、庄子(《老子》《庄子》);体现于楚辞,是屈原、宋玉;体现于法家,是韩非子(《韩非子》)商鞅……如若唐勒、景差与宋玉成

① 《文选》中陆机赋、文不少,成语留存于《辞源》亦较多,但也超不过宋玉。

② 因扬雄的成语只有三个,此比例意义不大。

③ 见《新编诸子集成·太玄集注·前言》第1页,中华书局1998年版。



就处于同一层次,那无论如何他们作品中的成语、成词总要保留几个下来,可实际情况是一个也没有,由此足以说明,唐、景二人在当时的成就就不能与宋玉相比。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赋祖之地位不可动摇!

现在,可以讨论本文开头提出的论题了。先看一下事实:

《文选》中没有唐勒、景差的作品。

《辞源》中也没有唐勒、景差创造的成语。

宋玉的以上成语,并非流传于萧统编《文选》以后,而是大多流传于《文选》问世以前。曹植《洛神赋·序》“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,遂作斯赋”,陆机《文赋》“缀《下里》于《白雪》,吾亦济夫所伟”等等,即足证这点。

我国文学史上能够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(不包括从史传等著作中摘出者),必定是“有篇有句”(包括成语)的,“有篇无句”,比之“有篇有句”,往往低一层次,也易于流传中失传。可以想见,唐勒、景差文章之艺术手法、写作技巧、美学品格等,均不及宋玉,然因没有作品比较,我们只能是推测甚至猜测。试想,如若他们也像宋玉那样,作品中有成语流传下来,即使没宋玉那么多,几个也行,那么围绕此成语,至少也应有点断简残篇存世,何至于完全湮没无闻!以致靠了司马迁《屈原列传》和宋玉的赋、文,才留名于文学史<sup>①</sup>。还可进一步推想:像“妾在巫山之阳,高丘之阻。旦为朝云,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,阳台之下”(《高唐赋》),“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,著粉则太白,施朱则太赤”(《登徒子好色赋》),“夫风生于地,起于青蘋之末”(《风赋》)等,如此佳句,唐、景二人作品中恐怕也没有。

由此,得到结论:唐勒、景差二人之艺术水平与文学成就,实不能与宋玉相比,二者并不在一个层

次。唐、景的赋、文,是否“有篇”,无法断定<sup>②</sup>,而“无句”则是肯定的。二人之文失传,固然有某些偶然因素,而作为先秦文献,其失传无疑是必然因素居多;同样,宋玉文章所以能流传千古,可能有某种偶然因素,而主要应当是必然因素在起作用。也许,在楚国倾襄王时代,唐、景二人之赋如散金碎玉,还能发出些许光亮,而至汉以后,宋玉之文犹如被发现之明珠,其光芒完全掩盖了二人。所以,我们既不应以唐、景二人之作失传怀疑宋玉赋、文的真实性,也不应以宋玉之作去推定唐、景赋、文之艺术成就和水平。说得更直接更透彻一点,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一定要改变了!

这就还需对司马迁的那段话反思一下。司马迁之所以说“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”,这可能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至西汉中期时,唐勒、景差存文已不多,缺少比照对象,司马迁主要是凭传闻判断;另一种是司马迁所言并无误,是我们理解出了问题;二者必据其一。就笔者而言,倒宁愿相信后者,司马迁可能是说三人属于同一类,同为著名赋家,然不是在同一层次,宋玉当时就高于唐勒、景差一到两个级别。他将宋玉摆于唐、景二人之前,也不仅是名次之先后,更重要的是显示级别的差距。总之,我们应以上面提供的材料和研究结论,去积极正确地理解司马迁的表述,而不对那两句话仅凭主观意度作胶柱鼓瑟似的理解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2]辞源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3.
- [3]班固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
责任编辑 刘春丽 E-mail:157476703@qq.com

① 按:《汉书·地理志》:“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,作《离骚》诸赋以自伤悼。后有宋玉、唐勒之属,慕而述之,皆以显名。”此段记述估计来自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。

② 现在看来,唐勒、景差之赋与文,即使“有篇”,也会比宋玉的低一层次。